

三年来俄罗斯政局变化叙议

黄宗良

苏联解体后三年多来,俄罗斯政局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一次又一次发生了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本文拟在简略叙述俄罗斯三年多来政局变化的大体经过之后,就人们所关注、看法又不尽相同的问题,如俄罗斯政局动荡的原因、政治斗争的性质以及俄政局发展前景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经过两起两落,走向相对稳定

三年来俄罗斯政局基本状况是:1991年下半年到1994年春,出现两起两落,1994年春天到年底,局势相对稳定。说两起两落,是以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叶利钦政治权力和威望升降为主要标志。

“8·19”以后,俄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息过。从1991年6月叶当选为总统至今三年多来,斗争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前3个阶段即1993年十月事件以前集中表现在总统、政府与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的斗争上,斗争的主要舞台是议会,即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斗争主要在原民主派中分化成的激进改革派和中间派中进行。

第一阶段是1991年下半年。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变。经过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动荡之后,长期板结的俄罗斯的社会进一步剧烈分化。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集结、组合、反复改组,出现了千余个政党、组织、“运动”,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二次建党高潮(第一次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代替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上升为主流派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内部开始分裂。1991年11月俄第五次人代会同意叶进行经济改革,授予其补充权力,使其有决定大政方针,包括决定政府改组的大权。叶处于权力和威望的顶峰,但总统与副总统鲁茨科伊之间的政策分歧已有表露。后者不同意放开物价的政策。

第二阶段是1992年。斗争全面展开并逐步激化。总统和政府实行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急进经济改革方案,一次放开物价,加速私有化,加重了经济危机。据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2年实际国民经济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9%,工业产值下降18.8%,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1992年初下降了44%。改革的受挫导致民主派进一步分化。1992年6月成立的“公民联盟”是从民主派中分化出来的中间派政治势力,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是其政治代表。此时,议会要求总统和政府修改经济改革的方针,考虑俄国的情况,实行渐进改革;要求收回总统的补充权力,限制总统权力(但还不是要求搞掉叶利钦);公开要求政府辞职(原叶兼任总理,6月份起由盖达尔代理总理),并于12月的七次人代会上由总统提名,经大会选出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主持“休克疗法”的代总理盖达尔下台。叶利钦的权力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威望下降。新任总理不属激进改革派。他的上任是两大政派妥协的产物,实际上削弱了叶利钦的权力地位。

第三阶段为1993年初至十月事件。议会与总统公开对抗以至最后发生流血事件。3月中

旬,叶发布告公民书,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谴责议会搞“违宪政变”,议会、副总统、宪法法院声明总统此举违宪,最高苏维埃决定弹劾叶利钦。最后双方妥协。人代会没有通过弹劾叶的提案,叶放弃“特别治理”,并在人代会上承认自己违宪,承认政府在经改中的错误。4月25日,全民公决,叶获得58%的投票者支持。斗争形势发生转折,叶获得政治上的胜利,摆脱了被动的局面。而后,叶利用政治上的主动权,把人代会、最高苏维埃、哈斯拉托夫等人排除在制宪的主导地位之外,主持召开制宪会议,于7月13日通过了以总统草案为基础的宪法草案最后文本。议会又发动新的攻势,决定暂停叶于5月份颁布的扩大私有化命令,否定政府提出的1993年国家预算方案;叶则重颁命令,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责令政府执行原预算方案。议会决定追究第一副总理舒梅科“受贿”的刑事责任,叶则解除了被认为与议会保持接触的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双方对峙对抗更烈。但中间派已发生分化。

9月21日,叶发布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分阶段宪法改革的命令”,宣布中止人代会,最高苏维埃的立法和管理职能,并决定于12月11—12日选举新议会;在新议会选出以前,“按总统的命令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决定办事”,这就是宣布解散议会。命令发布4个小时后,最高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罢免叶的总统职务,选举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总统,任命了自己的新的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长,并武装保卫议会大厦——白宫。9月28日,军警包围了白宫。中间派政治势力进一步分化。议会中有几个负责人宣布辞职。叶利钦对白宫断电断水断暖气,实行新闻封锁。10月3日,议会和议会支持者攻占莫斯科市政府,冲击中央广播电视大楼——奥斯坦基诺,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流血。10月4日晨,叶利钦在说服军队之后,动用了装备精良的空降兵的阿尔法部队4个师进攻白宫,经过10个钟头的战斗,占领了白宫,逮捕了哈、鲁等人,据俄官方称,在此次事变中,死亡142人,受伤700余人。叶利钦终于用武力解决了俄两大权力机构近两年的斗争,暂时稳住了自己的权力地位。

第四阶段是十月事变后至1994年初。围绕着新议会的选举和政府改组,各派政治势力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激进民主派又分化成各树一帜的四个竞选集团: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选择”,以沙赫赖为主席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亚夫林斯基—博尔德列夫—卢金的三人集团,以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同时选举新议会。新宪法以投票选民中58.4%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在政党竞选国家杜马席位中,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选择”被挫败,得票率仅15.38%;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得票率居首位,为22.79%。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取得重大成绩,得票率11%,名列第三^①。原来的中间派俄罗斯民主党,公民联盟也遭到失败。这样,就在国家杜马中形成了自由民主党,俄共及农业党等与已分裂的“民主派”势均力敌,甚至略占上风的新反对派。在1994年1月的政府改组中,急进派代表人物——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和副总理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退出政府,反对派和温和改革派在议会和政府中占主导地位,联邦主体在上院占主导地位。切尔诺梅尔金权力迅速上升,叶利钦的权力和威信明显下降。2月23日,国家杜马通过了大赦令。在十月事件中被捕的哈斯拉托夫、鲁茨科伊等获释,这对叶和民主派无疑是又一次重大打击。

第五阶段是1994年春至年底。政局趋于相对稳定,没有大的动荡。出现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社会已经十分厌倦无休止的争斗,希望“政治和解”,从而使政治斗争降温;二是议会、政府提出一些政见、主张较为合乎目前民众中多数人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或支持;

三是叶利钦总统采取一些协调措施来缓和矛盾、挽救危局、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如签订社会和谐协定,调换政府官员,根据国民情绪调整对外政策。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引起政派纷争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过渡时期要解决的任务——寻求俄社会新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部分地、起码也是暂时地得到解决。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比较明朗的轮廓,政治体制也有了初步的框架。虽然不能说俄已有了西方的三权分立,但也形成了三方(总统、政府、议会)权力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的局面。

此种相对稳定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尚难预测。今后斗争仍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一是叶利钦威信下降,且身体欠佳;二是经济不易搞好,政府难稳住^⑨;各派各怀目的,都想争权,目前正围绕 1996 年的总统选举,积聚力量,准备新一轮的斗争。

二、俄罗斯社会的过渡性质和不稳定性

分析俄国政局的变化的根源及其走向,首先必须研究俄国社会当前所处的阶段及其社会矛盾。

“8·19”事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被抛弃和苏共执政党地位的丧失,俄罗斯社会正向着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经过对 70 多年实践经验的反思、总结,各政治派别中的多数已有某些“共识”,如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搞多党制,建立权力制衡的体制等。这也可以称为俄国社会发展的“已知数”。但是,这个社会向何处过渡的问题总的说来并没有解决,俄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系,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过渡时期的初期,被否定的、被“破”的东西是比较明朗的,而“立”什么制度、体制只是依稀可辨。比如,传统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模式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原来的单一性的公有制被否定了,但建立哪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单独执政的政党制度被否定了,但实行什么样的多党制?一党高度集权,“议行合一”的政权体制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权力制衡体制?在对外政策上,是坚持还是放弃传统的俄罗斯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即使在不得不放弃传统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情况下,按什么主张(“欧洲主义”、“欧亚派”、“东方派”)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等等,都是未知数。所谓过渡时期,就是解立起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形成社会新的运转机制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混乱、不稳定状况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派争斗不止的原因是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方向。因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主张和追求,分歧、斗争是必然的;还因为掌握着主要的国家机器的政治派别在一定阶段又没有足够威望、权力和治国经验使社会普遍接受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于是,社会处于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政派纷争无序,政局变化无常,尤其是过渡时期的起始阶段。所以 1991 年下半年到 1994 年春,出现了“两起两落”。后来虽然有了政治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斗争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俄国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的任务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政治框架虽然有了个眉目,但有的政派还主张改变总统制,建立议会制,宪法也比较脆弱。

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是由不同的政党、组织、运动来代表的,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表现为这些政党、组织和运动之间的反复较量和斗争及其分化、改组。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一

个国家形成政党政治、建立新的政党体制,是一个长期和复杂曲折的过程。俄罗斯也不可能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各派代表人物的浮沉,是反复出现的正常现象。这是因为:第一,党派作为不同社会阶级、阶层、本集团的代表者,不是自己宣布的,而是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并非一次完成。因为人们对于本阶级、本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所在,对于各个党派的真正面目,对其纲领和政策都有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第二,党派、包括执掌政权的党派自身的纲领、路线、政策主张也有一个不断调整和修改的过程,同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各党派的分化、改组(甚至改名易帜)和他们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扩大或削弱。第三,在这样的社会转轨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瓦解,新的经济成分在生长、壮大,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党派力量的消长。此外,还有偶然性的、突发性的因素和事件,如有重大影响的党派的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乃至领袖人物的健康状况,都会引起社会上各派政治势力力量的变化和新的斗争。

三、社会制度的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权力之争

这里来说斗争的性质。三年多来俄罗斯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如此反反复复,打打停停,各政党和组织如此分分合合,实质何在?性质是什么?国内国外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这无非是权力之争。

无疑,从斗争的过程和内容看,三年多来的斗争包含着权力之争,并且权力之争的成分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和明朗,但其实质应该说是关于俄国确立什么社会制度,选择何种发展道路之争。权力之争是这个斗争的集中表现。

我们在前面已谈到俄国社会正处于确立新的社会制度、选择新的发展道路的过渡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映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以不同的党派和组织为代表的各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进行反复的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纲领、主张、方针、政策,使俄国确立起符合本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社会制度,使俄国社会朝着实现其利益的道路发展。

三年多来的斗争,主要围绕着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政治制度和体制、对外方针政策三个方向进行。从斗争的内容可以分析斗争的性质。

关于经济改革问题是斗争的触发点和斗争整个过程的主要之点。这里包含着经济改革的方式、方法之争,也包含着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之争。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以前的政府采取“休克疗法”,模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危机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加深了。前议会领导人主张渐进的、分阶段的改革,反对“休克疗法”。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斗争逐步激化。前议会反对派力图限制总统权力、改组政府是为实现其经济改革的主张服务的。“民主派”在准备杜马选举时再次发生分裂,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沙赫赖、索布恰克、亚夫林斯基等反对盖达尔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方针。^⑥至于俄共和农业党等新的“反对派”,则在建立什么经济制度上同“民主派”存在根本分歧。1994年10月的政府危机,也是由于经济形势没有好转引起。经济状况不好总是要引起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建立何种经济模式的争论。

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问题是斗争中更为尖锐的问题。1993年以来的政治危机,围绕着制宪和议会大选问题的斗争有其广阔和深刻的背景,并非光是某些政治家为实现个人野心

人为挑起的,仅用个人权力之争难以得到完全的解释。

制宪问题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任务。原宪法是1978年通过的,后来又经多次修改。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制定新宪法势在必行。而确定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是确立何种社会制度难以避免的根本问题。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这里一目了然地与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个人权力纠缠在一起,但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权力之争的范围。

议会大选问题也是如此。原议会(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是“8·19”以前于1990年5、6月间选举产生的,当时1041名代表中,登记为共产党员身份的有912名,“8·19”之后一直未改选。这种构成同后来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出现了维护与要求取消、解散人代会之争。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正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必然结果。

可见,两年多来斗争的实质是过渡时期确立何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之争。这里说的“社会制度”,既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根本制度,也指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体制和各种具体制度,如政治上的议会制或总统制,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属于广义上的不同社会制度。这里说的社会发展道路既指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也指同一根本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争是存在的。由于三年多来的斗争主要是在右翼政治势力和中间派之间进行,这一点容易被忽视。实际上整个社会各个政治派别都卷进这场斗争。

回过头来看,苏联(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变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代替传统的社会主义,以戈为代表的中派代替传统派上升为主流派;第二阶段是“8·19”事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叶为代表的“民主派”——右翼政治势力上升为主流派。“8·19”事变既是代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的又一次失败,也是以戈为代表的中派的失败。但斗争至此并未完结。尽管中央政治权力转移了,在转轨时期的起始阶段社会主义却远未消失:一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制度则基本上原封不动;二是权力机构没有完全解决,作为原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各级苏维埃依然存在;三是代表广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陷于瓦解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社会主义是其旗帜,维护和恢复苏维埃是其重要政治目标。我们认定俄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其中也蕴含这层意思。(当然,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是从广义上来使用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如何评价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坚持这种模式的政治势力是没有前途的,俄罗斯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前述要不要人代会和苏维埃之争是涉及确立何种政治制度和体制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仍然存在的各级苏维埃,不仅是一种形式、一个名称的问题。在俄国不少人的观念中,仍然是把它当作一个“议行合一”,要掌握全部权力的实体。或者说,力争把它变成这种实体。

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是从反共起步登上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其反共不仅是一种夺取和维护其权力地位的策略和手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叶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中再次举起反共的旗号,在十月事件中进一步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势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实际上,在十月事件中,虽然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派的牵头人物是曾以“建设性的反对派”首领出现的议长和副总统,但其基本队伍则不是“公民联盟”而主要是议会内外的激烈的反对派——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政治势力),逮捕安皮洛夫、查禁左翼报刊、迁移列宁博物馆、以及迁走列宁陵墓和禁止共产党参加议会选举的企图,都说明斗争明显地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指出

这一点并不意味中国由此应该改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方针。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的正确的、重要的外交政策。

在谈论斗争性质时,我们自然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似乎根本不存在个人权力之争问题;实际上,剧烈动荡的过渡时期,“乱世”的时势,最容易把政治欲望、政治野心浓烈的“个人”召唤到社会政治斗争的大舞台来。俄三年多来的政治斗争带有个人争权夺利的色彩和性质。但是“个人”离开作为基础、台阶的群体,是难以跃上政治大舞台崭露头角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表面上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实际上他们是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出现的。哈斯拉托夫曾是叶在“8·19”事件中的密切合作者,鲁茨科伊是叶1991年竞选总统时的伙伴。他们从政治上的合作到发生分歧、到成为势不两立、最后兵戎相见的政敌,分分合合,正是反映了俄国在社会急剧动荡和转折时期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确立社会制度、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中的分歧、矛盾和明争暗斗。同社会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的个人权力之争始终要受到其代表的阶层和集团的压力、影响、制约。政治家,即使是个野心家,一旦失去其社会支持,便会被抛在一边,难成气候!

四、影响俄国政局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经济和文化

由于俄国政局的变幻莫测,使得许多人难以对其发展趋向和前景作出预测。然而分析其政局走向、发展前景又是研究工作者不能绕开的问题。分析这三年多来政局的变化,可以看到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谈一谈经济和文化两个重要因素在政局变化中的作用,从中粗略地分析俄政局可能的走向。

在研究俄罗斯政治力量的变化、政局的发展趋势、政治斗争的前景时,不能不研究它与经济结构、经济改革的进程、经济形势的相互关系。俄罗斯三年多来的政局变化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说,后者是决定前者的基础,但决非唯一因素;前者又给后者巨大的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苏联原来的经济制度被否定,并不是由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如“影子经济”已经发展到足以摧垮旧经济结构的地步,因为它当时还很微弱,前者则十分僵硬;此时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思潮这些“软件”,寻求新出路的思潮打败了表面上统一的传统思想。而“民心”在重要历史关头的转向的最深刻根源还在于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已无法把经济搞好。

从三年多来的情况看,政治斗争主要在代表国营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集团和代表在变革中出现的私营企业主、新的暴发户的两派政治势力中进行,今后可能仍将是这样。国营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集团是原经济体制的最强大的支柱,在经济转轨的浪潮中首当其冲,利益受触动最甚。故以俄国工业家、企业家联合会为骨干的“公民联盟”曾经成为总统和政府的最有势力的反对派。在“公民联盟”失势的过程中,日里诺夫斯基提出停止军工企业转产的竞选策略,在军队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这是他在杜马选举中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原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表明,最大的困难是国营工业部门的转轨。在俄国,这个困难更大。因为它原来搞的是国民经济的准军事化,军工集团势力特别强大。据估计,俄国的军工企业转为民用需15年时间、1500亿美元。谈何容易!这造成了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长期性和“民主派”取胜的艰难性。^④

如果说,通过正常的政治斗争求得政治的稳定、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比用武力镇压反对派要难的话,那么,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解决经济问题、摆脱经济危机比解决政治问题、摆脱政治危机就更难了。叶利钦难以摆脱两难处境。他这一派权力地位的稳固,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旧经济基础、旧经济体制的瓦解,私有者队伍的扩大。这就要求通过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局的稳定又有赖于经济形势、经济生活的相对稳定。改革与稳定存在明显的矛盾。改革搞得太快,难免造成经济生活的波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在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上的分歧,常常是由于强调不同的方面引起的。叶派权力地位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是否在不断地摇摆和妥协中在上述矛盾着的两方面中求得合理的“度”。急进的经济改革方针政策的推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作为保证,叶派尚未取得这种地位。杜马选举之后,政府修改经济改革方针,宣布放弃“休克疗法”,修改财政政策、放慢私有化速度,稳定生产,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等。叶利钦公开承认:“不惜任何代价搞改革是一个错误的口号,负担过重的改革迟早会遭到人民的拒绝。”这些言行还是顺应时局的,还是明智的。

文化对俄政局走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这里指的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观念、习惯、思想理论、价值观等),又给予前者以巨大的影响。

现阶段的俄罗斯社会存在三种既相互区别、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俄罗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俄传统文化的突出表现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排外情绪、封建专制主义、个人崇拜等。西方文化集中表现为宣扬西方经济上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的优越性,崇尚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等。社会主义文化是指反映原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共产党的领导、苏维埃制度、公有制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等)的观念,在苏联解体后表现为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害怕竞争、害怕社会生活的动荡的情绪。

三年多来,甚至从戈尔巴乔夫上台主政以来,三种文化剧烈斗争,争夺俄罗斯思想舆论阵地;也互相影响、融合,此消彼长,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从选择政治经济外交制度和政策的斗争实际过程、表现和结果来看,大体说来,西方文化影响力在苏联变革浪潮和苏联解体前后,急剧上升,占了上风,从1993年开始有所消退。社会主义文化从苏联变革到解体过程中步步败退,但影响始终广泛存在着,特别是在基层群众和中下层官员中;1993年下半年起,其影响有一定的回升。俄传统文化是十分深固的根基,在选择俄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强烈的影响,在形成新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时也明显地起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看,未来的俄罗斯将由什么政治力量来主宰呢?笔者认为,顽固地坚持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带着斯大林模式的烙印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两个极端的政治势力难以成为俄罗斯主流派。十分重视俄罗斯传统文化这一根基,逐渐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积极的文化成果,吸收俄罗斯70多年来培植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转轨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不能不是多元的。就当前俄罗斯的政治派别情况来看,表现在政治上可能是几个派别联合掌权,一派单独占领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暂时性、突发性因素的作用下,在非常形势下,某些极端人物、小政治集团上台主政。但他们终将不能不逐步改变其政治面目,不能无视俄国的特殊国情和当今世界的潮流,不能不去执行俄罗斯交给他们的历史任务。叶利钦几年来在内政外交政策和人事上的不断调整,也许说明的就是这个发展趋势。

(1994年12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下转53页)

兵。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英国就直接出兵了,所以法国从1799年初就招架不住了。金融资产阶级见热月党督政府无能为力,便牺牲民主和自由支持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废除共和三年宪法。这充分说明,“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②西方政治制度雄辩地说明,在一般国家,只有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占主导地位时,才能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制。

注释:

①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52页。

②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近代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225页。

③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257页。

④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上册,第153页。

⑤(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娅等著:《法国史纲》北京编译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3页、374页。

⑥(苏)罗琴斯卡娅:《法国史纲·17世纪——19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1页。

⑦⑧⑨(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2、290、315页。

⑩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⑪⑫(法)阿·索布尔:《法国革命史,1789—1799》,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8、218页。

⑬(法)M·德朗德尔:《法国宪法史》第1卷,巴黎,1977年版,第314、316页。

⑭转引自索布尔《法国革命史,1789—1799》,三联书

店,1956年版,第196—197页。

⑮(法)J·戈德肖《1789年以来法国宪法》,法国加尼埃—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0年版,第95页。

⑯⑰⑱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下册,第593、594、594页。

⑲(法)阿·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杨人霖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下册,第622页。

⑳(法)M·帕内蒂埃:《1789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巴黎1981年版,第177页。

㉑㉒(法)M·德朗德尔《法国宪法史》第1卷,第329—330页。

㉓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7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㉕㉖(法)弗朗索瓦·卡龙著《现代法国经济史》,吴良健、方廷钰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均见第33页。

㉗(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工业社会兴起,王铁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㉘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

(上接46页)

注释:

①俄国家杜马选举对半分为两部分,一是政党竞选,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二是选区议席竞选,各选区按多数制原则选举。这两部分的议席加起来为各政党在国家杜马中占有的议席。这样,俄罗斯选择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占96席,自由民主党占70席,俄共占65席,农业党占47席,亚夫林斯基三人竞选联盟获33席,统一和政党27席,俄妇女运动25席,俄民主党21席,公民联盟18席。

②1994年经济也搞得不好,上半年国内总产值下降17%,工业产量下降25.8%,失业人数达到900万。因此,94年10月底议会举行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194票赞成,未获得法定票数(226票),提案未被通过。

③1993年俄国经济情况仍然不妙是促进民主派进一步分化的重要原因,根据俄国自己的统计,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2%,工业产值下降16.2%,农业产值下降4%,消费价格增长8.4倍,而月平均工资仅增7.6倍。

④据俄国一官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称,截止1993年10月初,俄有8.1万家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占现有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全部小型企业中,已有63%的企业成为私有企业。其中63%的商业企业,64%以上的生活服务企业 and 58%的公共饮食企业实现私有化。在工业部门中私有化程度最高的是轻工、食品和建材部门,私有化比例分别为57%,56%和57%。他认为农业的私有化速度最快。但据美国1993年10月11日《商业周刊》文章中说,俄大约有25万个私人农场,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0%、俄1993年谷物产量的6%。文章认为农村私有化步履蹒跚原因是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固守反对私人所有制的旧观念,害怕同新个体农民进行竞争,从各方面阻挠私有化,刁难个体农户。